

近代史研究

2

1983



JIN DAI SHI YAN JIU

回 忆 张 太 雷

王 一 知

广州起义和张太雷英勇就义，已经五十五周年了。岁月虽长，也不能冲淡我对他的记忆和悼念，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一

太雷是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幼年丧父，家贫，靠寡母为人做针线及亲戚帮助，抚养长大，小学、中学时代也是在贫穷中挣扎度过的。因为他学习成绩优异，亲友也乐于帮助。

太雷生前曾经对我谈过很多常州的情景，他的家庭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一九七九年春，我到常州参观访问太雷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观看了太雷祖居西下塘的老式房子。太雷童年居住过的鼎泰元治坊故址，地处常州西门外运河边，怀德桥西边。太雷上过的西郊小学那时就座落在桥旁，一狭长的半岛石龙咀上。他在读小学时，读过许多课外书，喜欢在同学当中，仿照《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中的情节，组织两军对垒的游戏，而且很爱打抱不平，看到弱小同学受人欺侮时，总是挺身而出。太雷读过的中学常州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为江苏省常州中学），校园房屋都已改建，仅存一棵大栎树和一座清末建校时的石碑，上刻常州府中学堂碑记，为太雷在校读书时的故物。太雷与瞿秋白曾是省常中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一同游历过的红梅阁景色秀丽，使人流连忘返。睹物思人，看到这些太雷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联想到他生前向我介绍的童年生活，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太雷在中学时代，积极拥护辛亥革命，注意阅读新报刊，探求新知识。他读过《民呼报》、《民立报》、《申报》，

也读过《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和《仁学》，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也都很感兴趣，认真研读。岳飞在常州一带抗金的故事，激励着年轻的太雷。有时他从同学家中借来一些野史笔记，对太平天国的故事、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的抗倭斗争等故事，往往看得出神。

太雷在中学时代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参加过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斗争，搞过抵制日货运动。那时中学学制四年，太雷应于一九一五年冬毕业，但因参加学潮，临近暑假时被开除学籍。不久后，他去上海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因北京大学学制太长，又考进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临时预备班。

他在一九一六年春到一九二〇年夏都在北洋大学学习。他曾对我说过，为了学费和生活费，及减轻家庭负担，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他课余还在《华北明星报》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他生性活泼开朗，豪迈热情，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在天津组织过一个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有科学文化的新社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重要骨干。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太雷及同学掀起了驱冯斗争，因此被开除了。

一九二〇年，他以《明星报》职业为掩护，替第三国际代表作翻译，并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又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年，他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的书记。那时，他还主持办一《劳报》，研究工人问题，报道唐山、长辛店工人的活动情况。《劳报》出了不到一个月被禁，又改名《来报》，取英文来波儿（劳工）“来”字的音，直到发行人被捕才停刊。

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到伊尔库茨克远东共产国际书记处工

作，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组的书记。同年夏，党派太雷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代表，他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并参加了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在莫斯科期间，他还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决定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显示远东民族革命的强大力量，向美日帝国主义进行示威。太雷参加拟定了召开大会的方案。当时参与工作的人对代表范围颇有争执。有些同志主张召开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太雷和一些同志则主张扩大反帝示威的范围，参加会议的代表从中、朝、日和太平洋岛屿所有革命组织一直到民族主义组织都可选派。共产国际执委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太雷在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中表现了沸腾般的热情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当时苏俄被帝国主义包围，各国代表如何安全越过封锁线是一大难题。太雷仔细考虑了路线和秘密接头地点，使各国代表平安往返。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召开大会的宣言是太雷起草的，标明大会的目的是：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口号是：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独立，耕者有其田，工厂属于工人。

在远东人民大会未开之前，太雷即于一九二一年八月间返回中国，为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助手和翻译，参加营救陈独秀和参与同孙中山谈判等重要活动，并联络中国选派代表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他还秘密赴日，联系日本共产党派代表到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人民大会。他在日本会见了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人。

一九二二年，太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一起草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纲领和章程草案。他在那年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时，担任会议主席，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与此同时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致了贺词。

他原名张泰来，又名春木，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张太雷。这不仅因为太雷与泰来同音，还愿把自己化为大雷，有震醒痴顽，打击强横的寓意。

他不到三十岁就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但他确是个大雷。他从五四运动到广州起义的年月里，进行的许多政治活动，所写的文章，所做的讲演，特别是他领导的广州起义，都如惊雷般震动了人心，动摇了反动统治的基石。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变——广州公社的火花，就是由他亲自点燃而熊熊地烧起来了。两个钟头就赤化了广州城！“真是一声霹雳惊破了敌人胆！”太雷在广州起义第二天，就被敌人的枪弹击中，壮烈牺牲了。他的名字，将永远同广州公社的光辉历史密切联系着。他是永垂不朽的。

二

我认识太雷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时，我正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

我入平民女校前，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〇一年，我出生在湖南省芷江县一个封建家庭里，因不满封建家庭，离家去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在五四运动中，我因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受到了校方的歧视和打击。我和进步同学一起进行了斗争，掀起过罢课风潮。但在那时仍苦于找不到救国之路。一九二一年夏天，我在女师毕业后，去向警予同志的家乡淑浦，在向警予创办的那所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初次读到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品。不久，我的同学王剑虹来信，向我介绍了上海平民女校的情况。收到了王剑虹的信，我非常高兴，便于一九二二年二月间与王剑虹等人一起，离开湖南，坐船去上海，进了平民女校。

平民女校是我党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同时又兼作党的接头机关。学校在一九二二年初春开学，设有工读互助班，专收年长失学或中等学校毕业后，有志升学而限于经济条件不得入大学的女生。到校后，我在高级班半工半读，一面学缝纫，一面学习。此

外，我还投入了浦东、闸北日本人开的纱厂、丝厂及英国人开的南洋烟草公司的罢工运动。当时，出面办校的是李达，住校的是国文教师高语罕，常来学校讲课的有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学校里没有固定的课目，哪位讲课的老师准备好讲课的内容，有空就来上课，学生是可以随时集合的。那时，我们是多么向往社会主义的苏联呵！当时从苏联回来的人还不多。刘少奇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后，也到平民女校来讲过课，并在邻我校的另一栋房子里设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室，我是常到会参加学习的学生。我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学习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学习了俄国在列宁领导下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理。少奇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民女校创办后，太雷也担任了领导工作，并以这里为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他因为另有任务，很少到我们学校来。后来才知道，他那时为我们党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去过广州。他在那里主持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代表党中央向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博等人做工作，帮助他们纠正偏袒陈炯明的错误，要求他们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所以那时太雷与同学接触得较少。可是，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我们在平民女校的几个湖南、四川籍的同学刚搬完家，因为一时没有钱，租不起木器，房间里空落落的，一件家具也没有。忽然有一天，大家从外边回来，看见地下放着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旧西装，里面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们把它拿去当了罢！”下面没有署名，不知是谁留下的。可是大家很快就想到：这可能是张太雷的，因为那套西装的尺寸相当大，只有象太雷那样个子高大的人才合适；而且，当时在我们接触的人中，太雷是常穿西装的，其他人很少穿。太雷为什么常穿西装呢？因为他去年为了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和会议，在旧货铺买了两套西装。后来一问，果然是他的。当时大家都很穷，同志之间这样推衣解囊是常有的事。有人说张

太雷那时曾与向警予等同志一起领导过上海女工同盟罢工，并为此经常来平民女校与各厂罢工工人讨论罢工的策略。可是我却记不起有这样的情况。

三

一九二二年秋，上海大学开办，次年秋，上海大学增设了社会学系。这时，我与几个湖南、四川籍的同学从平民女校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海大学也是我党所办的，原为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华界青云路青云里，是两幢石库门房子。因发生学潮，校长被逐，公推当时名望较高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来当校长，改名上海大学。于右任不过挂名而已，并不到校办公，校务实际由邓中夏等同志主持。那时，瞿秋白同志是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蒋光赤等，都在校任过教职。太雷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也曾短期在“上大”当过教员。一九二三年七、八月间，我曾经与太雷在一个党小组。党小组长是许德良，小组成员有瞿秋白、张春木（即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施存统、邵力子、张特立（即张国焘）、邓中夏和我。我们一些同学时常遇见太雷。听说太雷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即参加了预备会议，并与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向警予及马林等人一起参加了“三大”决议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张国焘关门主义最有力的人之一。在上海大学的接触中，我们常常由苏联革命经验谈到中国革命问题——革命阶段、性质和革命同盟军问题，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等，他给我们不少指教和解释。他的语言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总是在我们谈论得非常热烈或是有争论、有疑难的时候插进几句话。而他那简单的几句话，总是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有不可争辩的逻辑力量，常使我们疑难解决，争论停止。他没有架子，总是朝气蓬勃、愉快活泼的。他还喜欢开玩笑，有他在场，总是谈笑风生，欢腾四座。

四

太雷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时间不长，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了。在党的“三大”以后，国共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党的“三大”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共产国际为此也做了不少事。一九二三年八月，太雷去苏联就是国共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孙中山派出了有太雷等共产党人参加的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问题。九月，苏联政府派鲍罗廷任驻广州常设代表，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太雷虽然未能参加国民党“一大”，但国共合作的形成，他是有功绩的。

后来太雷同我谈到，在代表团到达苏联以后的活动中，太雷同蒋介石是有过斗争的。代表团结束了访问苏联的使命以后，太雷并没有随同代表团一起回国，而是继续留在莫斯科。因为在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曾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于是那时就留下来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同时，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一九二四年一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太雷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代表一起，在萨拉托夫斯基车站肃穆哀痛地迎接了列宁的灵柩，在工会大厦瞻仰了列宁的遗容，并参加了列宁的葬仪。太雷在苏联的活动情况我们当时无法知道，但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却看到了他署名泰雷的从莫斯科发回的悼念列宁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列宁底死》。那时我们在上海也开展了悼念列宁的活动。我读了他那篇文章，好象看到太雷在列宁遗像前庄严宣誓。文章用朴素的语言，生动地记述了苏联人民对列宁的衷心爱戴，表达了中国无产

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列宁逝世的深切哀痛，并且记述了他在莫斯科亲身参加的悼念列宁的活动，特别是记述列宁的棺木抬出萨拉托夫斯基车站时的情景：“当时头上大雪纷纷，鸟雀无声，只似乎听见接者底心底哀音。出车站后棺木在前，送者随行，走过的街道，两旁军警排列，阻止拦入行列，然而屡见老幼争相冲入重围，冀得随送。街中澈静，两旁观者无数，然而一声不闻。”催人泪下，感人肺腑。那一年的五一节，太雷在苏联为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发自内心地写道：“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表示中国工人“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

后来我还知道，太雷在苏联曾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了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那时，他与李大钊同志联系非常密切，向大钊同志等详细介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协助中国代表团作了不少工作。太雷在苏联那段时间里，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片山潜，越南的青年革命家胡志明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共同研讨着东方各国的革命问题，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三个人有一张珍贵的合影，显示出亚洲三个国家革命者之间的兄弟情谊。

五

一九二四年八月，太雷从苏联回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担任负责工作。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比过去多多了。因为那时我也在团中央妇委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在这一段日子里，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了解到他有非凡的才能。他作事、写文章好象毫不费力。他又有无穷的精力，日夜地工作（他那时在上海《民国日报》任主笔，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因而常常深夜才下班），总是神采奕奕，毫无倦色。那时，太雷既为《民国日报》写文章，看大样，又要为党刊《向导》写文章，为团刊写文章。他所写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共产国际“五大”、少共国际“四大”决议的精神和策略，揭露

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方式，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弱点，阐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逻辑性和说服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列宁逝世将近一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太雷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还赶译了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一章，以《马克思政治学》为题，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共四天，在《民国日报》副刊连载，为此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使《民国日报》一时成为我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了。会址在闸北横浜路六号。太雷参加了这次大会。党的“四大”总结了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来的经验，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太雷积极参加了“四大”的筹备工作和大会期间的各项工作，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分工主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四天之后，太雷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太雷在这次团代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重新估量了全团的工作，坚决贯彻了党的“四大”决议的精神。大会制定出的决议比以前两届团代会的决议更加具体、切实，“不仅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经验。”这次团代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雷当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六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革命加快了步伐。一九二五年春，党派太雷去广州，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我在炎热的夏季，从上海去广州，协助太雷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同太雷生活在一起了。

太雷从到广州以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他都与鲍罗廷在一起，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在广东区委负责宣传工作。

我们住在鲍罗廷顾问的公馆里，鲍公馆座落在广州东较场附近，是一所两层的花园洋房。鲍罗廷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住在楼上，有时，有些苏联军事顾问也住在楼上。我们则住在楼下。楼下还有一个翻译室，有几名翻译人员，专门从事当天各地报纸的翻译工作，译稿经整理之后供鲍顾问参考之用。记得翻译室中的人员有李仲武、黄平、傅大庆、卜士崎等人，这个翻译室也归太雷领导，我协助太雷作日常的选材工作，常常是太雷和我两个人挑出要译的内容，分派有关人员去翻译。在太雷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就由我来安排。到广州以后，太雷的工作比在上海时显得更加繁忙了，他与鲍罗廷在一起，日夕同国民党的领袖们相周旋，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国民党军政首脑来与鲍罗廷会谈，每周这些军政首脑还要到鲍罗廷处来开几次会议，这都需要太雷陪同并任翻译。鲍罗廷出去讲演，也是太雷同去。总之，鲍所有活动，是离不开太雷的。而且，事前的准备，事后的整理，都需要太雷来作。

在广州工作时期，太雷兼有国共两党的职务。在我党中，他参加了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主要是负责宣传工作。由于他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广东区委许多重要政策的研究，太雷都参与其间。

五卅反帝斗争的风暴，影响是很深远的。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香港和广州的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听太雷说，广东区党委发动这次大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前策划得非常周密，有关的重要决策都是在鲍罗廷顾问那里商定的，具体行动则由区党委分派专人去办。我是在省港罢工高潮期间，沙基惨案发生之后，廖案发生前不久，到达广州的。廖仲恺被暗杀以后，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都到鲍公馆来商讨过对策。省港罢工期间，主要决策问题，或由延年、中夏、恩来、兆征、太雷、彭湃分别商量，然后再与鲍罗廷顾问商谈，作出最后决定，或由

他们与鲍顾问直接商量，研究对策。陈延年同志和广东区委的其他同志，白天忙于各项工作，通常多是在晚上到鲍公馆来，有时要商谈到深夜。太雷每次都参加，既当翻译，又参与商谈工作。黄平说：“关于罢工的问题，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总是晚上九点钟以后才找鲍罗廷的，每次都谈到十一、二点钟才离开。鲍罗廷很严肃，但也很好讲话。他们碰头，不是会议形式，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每次总摆一些沙田柚、香蕉之类的水果，大家边吃边谈。”赖先声在回忆陈延年同志的时候说，延年同志“有关主要的工作决策问题，大都事先与中夏、恩来、太雷、兆征、彭湃、瞿仙、尔松、穆青等各负责同志以小会方式，分别商谈作出决定，或再找鲍罗廷顾问商量参考，再作最后决定。”他们两个人的回忆都是符合事实的。

我到广州以后，很快就与胡志明结识。胡志明那时在名义上也是鲍罗廷的助手。鲍公馆的楼下，除了我和太雷住的房间之外，沿走廊还有一排房子，胡志明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胡志明也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去的苏联，同太雷一起参加了列宁的葬仪。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五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四大”，以及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他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来到广州的。他在广州化名李瑞，又名王山而（即“瑞”字的三个组成部分拆开）。我们那时都叫他李瑞同志。胡志明为人很真诚，他常对我们说：共产党员对同志对人民，都应该真诚。胡志明同我们非常友好，他和太雷在苏联时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时又在一起工作，倍加亲切。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屋里来，我们也常常到他房间去。他经常在自己的房子里用手枪和步枪打靶，太雷有时也和他一块儿打。他在广州的主要任务是同越南的革命者联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成立越南工人阶级的新型政党而努力工作。他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出版《青年周刊》，开办越南革命青年的“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从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七年春天，胡志明都在广州，领导越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中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们也积极支持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

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非常需要作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也有便利的条件作宣传鼓动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广州的反动军阀杨、刘和陈炯明都被广东政府打垮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大为巩固，工农群众运动也大大开展起来，特别是因为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开始以来，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的有二、三十万人，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过多次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为沙基死难烈士进行国葬等。记得那时在东较场开起群众大会来，总有十万人以上。每逢有这种集会，广东区委的领导同志都去参加，我和太雷也去参加，胡志明和其他在广州的越南同志也参加。省港罢工期间，我们经常到罢工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讲形势，讲政策。东较场开大会的时候，东一个演讲台，西一个演讲台，都需要人去讲话。苏兆征、邓中夏去讲，太雷去讲，连我这个不会讲话的人也得去讲，鲍顾问、胡志明也经常去讲。胡志明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法语也很流利，平时他在同我和太雷等同志讲话以及对省港罢工工人演讲时，都用中文，在正式的国际会议和社交场合用法文。那时在广州还有许多朝鲜同志，他们也时常通过太雷与鲍顾问联系。

太雷对即将来临的斗争非常兴奋，对胜利满怀信心。他日日夜夜地忙，却总是精神抖擞。他常常鼓励我写文章，作讲演。他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啊！而且有条件写和讲！”我那时在广州妇女协会宣传部工作，所以做的也就是写和讲的工作。我本来是最不会讲话的，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太雷的鼓励，也大着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我们把到群众中去演讲，叫作“上阵”。每在上阵之前，太雷对我的演讲内容，总要仔细地加以指点。演讲回来，他总要风趣地问：

“这一仗打得如何？”我若答复他“又打败了！”他就说：“下次再准备得好些！”我若说“还可以”，他就很高兴地鼓励我说：“你看，我说对了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吧，只要肯练？”

太雷工作起来固然总是不知疲倦，废寝忘餐的，但若有一点余暇，得到休息，一玩起来，也常是兴高采烈。他对下棋、打球、听戏、郊游都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身体强壮，精力旺盛，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工作和游戏都如生龙活虎一般！

假日，我们有时还到市郊去，到新屋顶花园去。夏夜也曾到珠江去泛舟。太雷对于大自然是非常热爱的，一片森林，一弯流水，都能把他吸引住，舍不得离开。他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感到祖国处处是锦绣。他愈爱这些河山，就愈愤慨祖国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践踏宰割，革命意志就愈坚强。他也爱城市的喧嚣。当他站在屋顶花园俯瞰广州市容，见行人熙来攘往，听到沸腾的市声时，当他坐在珠江的小船上，看满江点点灯火游动（多少船啊），听叫卖声声时，更唤起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他常愉快而兴奋地对我说：“生活多可爱呵！我们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他不大会唱歌，也不大喜欢诗词。但岳飞的《满江红》词他却记熟了，不仅会背，还会唱，在他有所感触的时候就唱。他还常常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两句歌词常在他嘴里哼着，因为这两句歌词正表达了他和每个共产党员的意愿。

七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加猖獗起来。蒋介石表面上装作与共产党合作，骨子里是反共的。他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当作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资本。在第一次东征以前，我们党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址起初设立在大沙头，后来迁到南堤肇庆会馆）。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指使他的党徒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唱对台戏。太雷到广州以后，经常与鲍罗廷一起去黄埔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他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后来知道，一

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青年军人联合会曾举行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太雷和鲍罗廷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给予了热情支持。那时李之龙也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那年八月，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和第一军军长，力量强了一点，反共的面目就暴露一点。那年十二月，蒋介石公然提出，在黄埔军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应该公开，国民党要加入共产党的须得到校内国民党部的批准。可是那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没有地位。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蒋介石的力量扩大了，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的反革命阴谋。那时，鲍罗廷和加伦将军都到北方去了，陈延年同志去上海开紧急会议后刚刚回到广州。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山舰事件前夕，他发现蒋介石与右派往来密切，察觉蒋介石的神色不对，曾报告了张太雷，但当时的苏联顾问没有重视这件事。

那时太雷是广东区委的常委和宣传部长，主编《人民周刊》。他对蒋介石等人的阴谋也是有警惕的。在中山舰事件前的两个月当中，他所写的文章，非常注意领导权问题。在《二七之意义》一文中，太雷强调指出：“二七运动最是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已担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责任。”在巴黎公社五十周年纪念日，太雷到广东大学礼堂作了关于巴黎公社事略的报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阐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并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出“资产阶级是有妥协、卖国的可能，”“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太雷又系统阐述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后的三大政策。

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斗争和全国与广东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局势演变，使太雷在中山舰事件前的一段时期里心情时常显得很沉重，总象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不断揭穿国民党右派的鬼蜮伎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即中山舰事件的前一天，太雷还在

《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在这篇犀利的短文中，太雷敏锐地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是存在着呵！一般革命党人醒醒呵！”他大声疾呼：“革命的同志们，广东的危险仍在呵！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拿暗幕一揭开，内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阴谋与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

第二天，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太雷当天得到出事的消息，他就非常肯定地对我说：“李之龙决不会叛变，这里面有鬼！”他很沉着，不过这件事刺激了他。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走，陷入沉思的境地。那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我知道他在计划如何斗争，他还向陈延年同志提出我党应组织十万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其实，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分裂统一战线。但是当时苏联顾问和汪精卫都害怕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我党中央也未采取有效对策予以有力的回击。于是，蒋在制造事件之后，乘机声称系“个人问题”，表示不因而“牵动全局”。

蒋介石在加强了自己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以后，接着又从党务上向我们党展开了进攻。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却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政策。党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议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七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我党同志全部辞职，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当国民党中央执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只不过，这时还没有开始北伐，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不敢公开反共，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口头上仍然表示联俄联

共，一面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图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

在苏联顾问和我党中央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革命派欣喜若狂，而我党同志和工农群众以至国民党中的左派党员都对时局表示深切的忧虑。面对这种局势，太雷更加激愤，深感对反动势力有予以反击之必要。首先，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的名义所写的《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另一篇是太雷自己署名的一周述评。《公开信》最后严正指出：“共产党决计不因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并且警告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公开信》代表中共广东区委提出：“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在一周评述《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中，太雷指出，三月二十日事件证明本刊上一期所提出，“广东革命危机存在”的警告是正确的。《公开信》和一周评论均发表于三月三十日出版的《人民周刊》第七期上。这两篇文章是太雷与陈延年同志反复商讨后写成的。平时，延年同志作为区党委书记，对《人民周刊》每期上的文章都要仔细审阅，并常常亲自作些修改，或同太雷共同酌商定稿。这时，他与太雷更是反复研讨，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天天见面，经常彻夜不眠，太雷与延年同志彼此友谊深厚，相互非常敬重。

在起草《公开信》和一周述评的同时，太雷还在与延年同志商讨之后写了《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草成以后，交给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新闻》。这篇文章本应在三月三十日见报，但却被蒋介石控制的广州市公安局所派检查员抽去，以致延到四月一日才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为此，太雷在《人民周刊》第八